

文化战线上的秘密党员

在革命年代,有一些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或者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名人,出于斗争的需要,一直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公开活动。他们为争取和团结无党派人士,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郭沫若、沙千里就是文化战线上的秘密党员。

郭沫若故居、沙千里故居等名人故居开放的意义,不仅是品味中国的历史文化积淀,更是让今人能学习到前人为了祖国命运抛头颅、洒热血的爱国主义精神。在秩序井然的故居里,游客可以静心品味他们的非凡人生历程及不朽精神。



↑ (左起)王造时、史良、章乃器、沈钧儒、沙千里、李公朴、邹韬奋(资料照片)

← 郭沫若故居

1

郭沫若故居 是学问家也是革命党人

北京前海西岸旁是南北向的前海西街,中段18号便是郭沫若先生的故居。1963年秋,郭沫若由西四大街胡同5号迁入此地,至1978年病故,他在这里度过了晚年岁月。

迈入大门,入目是一片青翠的花园,沿着幽径向前,有一尊郭沫若的青铜雕像,其造型是以抱膝的姿态安坐在几棵银杏树下。银杏是郭沫若最喜欢的树,他称其为“东方的圣者”,其中一棵甚为繁茂,是其夫人于立群患病之后,他特意从大觉寺西郊林场移植来的,并起名为“妈妈树”,寄托着全家的祝福。

二道垂花门内,是一个开阔美丽的四合院,几十年过去,所植乔木已高大葱茏,灰瓦红墙掩映在碧树浓荫中,显得十分幽静,与墙外什刹海景区的熙攘喧嚣隔绝开来。院中正房,是郭沫若的客厅、书房、卧室。客厅沙发摆成马蹄形,钢琴前那张略显狭窄的单人沙发,是接待客人时郭沫若常坐的位置。客厅东接书房,西墙一排书柜上方挂着一幅毛泽东的真迹《西江月·井冈山》,十分引人注目,对面则是于立群的隶书作品,内容是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雪》。南窗下对置两张书桌,是郭沫若伏案工作之处,晚年他就在这里完成了《李白与杜甫》等作品。正房后有一排罩房,中间一间专用于于立群写书法所用,郭沫若常在这里和夫人一起写字赏字。

郭沫若原名郭开贞,沫若是他在日本留学发表新诗时开始使用的笔名,取自故乡的沫水(大渡河古称)和若水(雅砻江古称),寄托着对故土的怀恋。在日本,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,1926年应邀赴广州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前后,又接触到瞿秋白、林祖涵(伯渠)、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,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和赞同,确立了自己的信仰。经过考虑,他向党员毕磊提出加入共产党的愿望,毕磊与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、学生

运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研究后,建议郭沫若先参加一段时间的实际革命工作。郭沫若接受安排并立刻做出了行动。1926年7月,他毅然投笔从戎,参加北伐,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。1927年蒋介石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前夕,郭沫若借住在南昌朱德家中,连夜写就檄文《请看今日之蒋介石》,揭露蒋介石是屠杀民众、出卖革命的刽子手。在随后爆发的南昌起义中,郭沫若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,起义部队转战至瑞金时,在一所小学里,由周恩来、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,从此在党的领导下,直接参与到革命斗争中来。

1928年,在党的安排下,被南京政府通缉的郭沫若赴日本避居,其间深入研究古代社会,完成《中国古代学术研究》一书。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后,郭沫若毅然毁家纾难,只身回国,呼吁“四万万人民齐蹈厉,同心同德一戎衣”。国共合作后,他出任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,团结文化人士,开展抗日宣传。在忙碌的政治工作期间,他依然笔耕不辍,创作了《棠棣之花》《屈原》等历史剧,借用古代士人的人格精神传达民族向往自由的呼声,还完成了《青铜时代》《十批判书》等学术作品。1944年所写名篇《甲申三百年祭》,被中共中央定为整风文件。

郭沫若一生有诸多头衔,诗人、文学家、历史学家等,象牙塔中的学术和十字街头的革命看似难以共存,但郭沫若以惊人之力,在两极上均做出巨大成绩。中国矿业大学(北京)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卢刚说,郭沫若首先是个革命家,他进行的学术研究和创作,也是为革命服务的,可以说,对他而言,革命是“自变量”,学术是围绕革命的“因变量”。正如1978年郭沫若逝世之际,邓小平在悼词中称他为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,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”。

2

沙千里故居 坚贞不屈的“七君子”

东四六条55号,庄严的大门上,挂着两盏红灯笼。很少人知道,这是著名爱国人士沙千里的故居。

沙千里出生于上海,幼时家贫,当过学徒,后来就读于上海法科大学,成为一名律师。他思想进步,和同人一起办刊物,成立进步社团,积极投身救亡运动。1935年,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,令沙千里深为震动信服。但南京政府奉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,枉顾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,依然对红军加强围剿,引起各界爱国人士的不满。

1935年“一二·九”运动后,抗日救亡运动掀起新的高潮,上海各界成立群众救国组织。1936年5月,在全国60多个爱国组织的基础上,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,选举马相伯、宋庆龄、何香凝、沈钧儒、邹韬奋、章乃器、史良、王造时、李公朴、沙千里、陶行知等40余人作为执行委员。1936年11月23日,南京政府以救国会支持日本纱厂工人罢工为借口,非法秘密逮捕沈钧儒、章乃器、邹韬奋、史良、李公朴、王造时、沙千里七人,以“危害民国罪”定罪,是为“七君子”事件。七人都是著名社会人士,也都是救国会领导人,因“爱国”入狱,激起全国民众义愤,各

界纷纷奔走营救,中共也努力尝试营救和斡旋,要求释放七君子。在多方努力下,1937年7月31日,七君子终于出狱。

出狱后,沙千里继续投身抗日事业,并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利用律师的公开身份,为被迫害的民主人士进行辩护,伸张正义。1942年,他加入由沈钧儒等发起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(1944年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)。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云笋说,沙千里把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融入民盟,促使民盟不断向中共靠拢。1944年10月,民盟提出要反对蒋介石独裁政府,建立各党派联合政府,这和中共的主张一致。

从抗战到解放,民主党派、民主人士和中国共产党始终通力合作。1948年,应中共之邀,此前因时局被迫转移到香港的民主人士分批返回解放区。沙千里、沈钧儒以同盟会和救国会的名义发布声明,提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可以说,沙千里的一生,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亲密关系,彼此肝胆相照,荣辱与共,为建立一个富强民主的新中国共同奋斗。

据《北京晚报》

